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武汉地区的斗争方略

——纪念武汉解放四十周年

吴 仲 炎

抗战胜利以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熬过了7年悲惨生活的武汉人民,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萌生了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可是残酷的现实使强烈的希望立即变成了强烈的失望。1945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休止地抓兵筹饷,调兵遣将,迭次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摆在武汉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对美蒋统治,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当时,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是从解放区自卫战争与蒋管区人民民主爱国运动的配合发展中,取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在长达7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党在武汉的活动长期中断,鄂豫边区党委的城市派遣工作时断时续,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后改称为重庆局、南京局、上海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策略方针,从革命形势与武汉的重要战略地位及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派人到武汉开辟工作,重新建立党的组织,恢复党的活动。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说过:“目前武汉是块沙漠,党还没有深深扎下根。你们返回武汉的人就是‘垦荒’队员,去开垦这块沙漠,把根深深扎下去。”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在同派遣到武汉开辟工作的负责人曾惇谈话时指出:“武汉是革命名城,党在那里有很深的影响;武汉又是华中重镇,南北交通要冲,做好武汉的工作,对全国都有影响。”他还指出:“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即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一) 由荫蔽精干到进攻发展

来到武汉开辟工作的同志,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首先找到职业,取得合法身份。他们十分注意荫蔽,扎根于群众之中,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

董必武曾殷勤嘱咐来武汉的地下党员要“熟读圣贤(马列)之书,广交天下之友”。钱瑛也嘱咐为曾惇打前站的赵忍安到武汉后,一要注意荫蔽,二要广交朋友。赵忍安到武汉后,以自己的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的身份,广交金融、工商界人士,同上层人士打交道,同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万耀煌、张笃伦等结识往来,为掩护自己、掩护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经南方局组织部派遣回湖北开辟工作的陈克东等一批土生土长的地下党员，他们以自己社会联系多、情况熟的优势，为地下党搞交通联络，并筹集活动经费。

在工厂中扎根的刘实等一批从重庆来的同志，他们通过武汉工商界进步人士陈经畲的儿子的关系，先到义顺油行炼油，修锅炉，做包活。初步站住脚以后，再通过其他的社会关系到其他工厂找活干。

地下工作人员，不仅干一行精一行，而且完全群众化。例如，曾惇初到武汉时，当过震寰纱厂的技术员，有次厂方要他设计一座楼梯，他买些有关书来看，并向老木工师傅请教，画出图来，照他设计做的那个梯子居然还不错，群众还把他叫“工程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位大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同学，叫张瑾格，河南人，她与地下党联系之后，被派到纱厂当工人。这位出身教授家庭，过惯了优裕生活的女大学生。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学会了纺纱技术和一口流利的武汉话，同几位女工成了知心朋友。另一位是男同学，叫刘绵，出身于宦宦之家。他通过上层社会关系，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武汉行辕当上了内总收发和中尉机要课员，掌握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机密。

在群众中扎下根之后，审慎地发展党员，几支力量汇合一起，成立中共湖北省工委和中共武汉市工委，实行单线联系，学运两个系统平行作业，实行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机构与秘密组织分开、城市工作与武装斗争分开等原则。

荫蔽精干决不是消极的，而是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出发，通过斗争积蓄力量，促使敌我力量彼消我长，作好决战前的准备，争取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正如当时白区工作领导人刘宁一所指示的：象山里的水，外面看不见，里面却在流动。

在敌我力量对比虽有所变化但一时尚不利于实行全面进攻时，党审时度势，组织好胜利后的退却与退却前的进攻。在一个大的运动和斗争取得胜利时，则有计划地部署胜利后的退却。1947年5月，在蒋介石集团前线大败，后方危机深重，大肆镇压民主运动的情况下，党针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扩大宣传，尽情揭露其反动本质，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造成强大的革命的舆论；但是，在行动上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去硬碰。因此，当北平学联提出6月2日举行全国总罢课的号召之后，地下党十分注意各方面的动向，并且从李书城、张难先等元老人物那里得知反动派的情况有些异常。“六·一”惨案发生前两天，地下党派人到武大提醒核心分子：“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看，国民党这次很可能下毒手，6月2日的罢课最好改期举行。”武大核心组商量后认为，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要改变计划已来不及了，只好对第一线的积极分子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在“六·一”惨案发生后，地下党提出了如何进行斗争的六条意见，如成立“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派出赴京请愿团，以及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立即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保证今后不许军警宪特进入学校非法捕人等。其目的是打破封锁，冲出学校，向各界揭露惨案真相，争取社会声援，把目标直接指向蒋介石反动统治，以便通过这次抗暴斗争，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敌人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宣布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查办，拘捕稽查处长胡孝扬，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与此同时，汉口联营书店的马仲扬等6位同志，也从“军人监狱”里获释。

国民党联勤总部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及该厂工人的抗暴斗争，也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群众和党员。工人们组成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发表了《告武汉工人兄弟书》和《告武汉各界同胞书》，提出了“杀人者偿命！”“给死人报仇！”等口号。接着举行追悼大会。在

群众运动压力下，敌人只好当众逮捕枪杀工人的厂警队的头目，将厂长停职，并答应了发放奖金，抚恤死者家属等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以后，武汉人民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烈火更加蓬勃地燃烧起来了，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浪高一浪，冲击着反动统治的基石。就在这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转折关头，反动派狗急跳墙，对人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在武汉，则有武汉被服厂第二次罢工斗争被镇压；此后，还发生了汉阳武工队和位于黄鹤楼黄巷的红十字会补习学校（地下党的地下印刷机关）被破坏事件。党审时度势，一面火速通知有关同志转移，一面设法了解被捕人员在审讯的供词和在狱中的表现，以便采取对策，力争把机关被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并针对当时敌人疯狂镇压革命力量的情况，决定暂不搞大的运动。钱瑛指示武汉地下党在工作上暂时收缩、要武汉地下党把大江两岸的工作交给新四军第五师，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武汉的工作。为此决定成立武汉地下市委，撤销湖北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钱瑛叮咛曾惇：既要注意保存力量，又要随时待机出动。

按照上级的指示，地下党即使是在环境急剧转向恶化之际，仍然继续保持饱满的旺盛的斗争热情，不失时机地捕捉战机，有计划地部署退却性的进攻。虽然敌人在1948年8月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传讯了武大18位同学，但我们仍然百折不挠地进行了反传讯的斗争。并在一些单位发动了罢工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武昌第一纱厂工人1948年中秋举行的大罢工。经过一年多时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尖锐斗争，武汉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发展壮大。这就为下一段迎接和配合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地解放武汉三镇，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当决战时机，即“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这个“时机”到来之际，则在坚持“荫蔽”、“埋伏”的方针下，更加注重放手发动群众，英勇果敢地进行战斗。例如武汉大学，经过长期斗争和积蓄力量，特别是在1948年下半年，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到了决战时刻，仅地下市委系统，就在武汉大学形成了一个有近80名学生党员的党总支，和一支有300多名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的积极分子队伍，成为武汉地区党员和骨干队伍人数最多的一个战斗堡垒。在那里，地下市委学运两个系统适时地实行合并，从总支到分支实行会议制和总支、分支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4月，地下市委决定在武大成立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对教运和学运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学生中，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建立了学习小组（也是应变小组、生活小组、战斗小组），把广大同学紧密地团结在党总支的周围，团结在为党组织所掌握的公开合法机构——学生自治会和安全互助团的周围。有什么活动，只要通过这两个机构公开号召，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在院、系、级、组中串联、发动，就能迅速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在那里，原来只能在绝对荫蔽秘密状态下才能进行的活动，如学习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文章，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练习解放区的歌舞，排演解放区的剧目，举办关于党的各项政策理论问题的报告会和座谈会，进行校产调查登记，发展联防警卫活动，编印发行红色报刊等等，因其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绝大多数人所热烈拥戴，所以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了；而那些极少数反对派的反对言行，因其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不得不转入地下。

在决战时刻，在组织上也有所转变。原先实行单线联系，两个系统平行作业，此时则形成会议，加强统一领导；原先因暴露而转移的地下工作人员，此时则相机调回，投入战斗；原先由发展到巩固，在发展中求巩固，此时随着斗争的纵深发展，则由巩固到发展，在巩固中求发展，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注意发动中间和落后的群众，审慎而积极地吸收在斗争中

涌现出来的新积极分子入党，原先党员身份是秘而不宣的，但在关键时刻，对关键性的策反对象，当其思想斗争激烈之时，则以党员的身份挺身而出，拉他一把，促其下定决心，承担特殊使命；如此等等，都是应时而变，应运而生，应势而动。

在决战时刻，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真空”时刻出现时，原先居于幕后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各级领导成员，此时则亲临前线，进行指挥。当大军摧毁长江防线，一举解放国民党反革命政治中心南京时，地下市委通过了《为保护城市渡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决定实行“分江而治”，建立武昌分委，并在江北、江南分设两个指挥部。5月15日白崇禧及鲁道源城防部队撤退时，市委领导成员按原定计划进入了荫蔽的指挥所，通过事先编制好的电话网络指挥战斗。组以上的干部也到达预定的重点单位和要害部门指挥战斗。

此时此刻，原先使用的常规战术远不适应了，要打破常规，放开手脚，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例如，汉口电信局是地下市委在激战时进行指挥的神经枢纽，也是敌人一定要进行破坏的重点单位。5月15日上午，局方接到白崇禧的命令，限16日拂晓前将所有机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彻底破坏。这时在该局坐镇的市委委员刘实派该局党支部书记向法院的地下党员取回白朗宁手枪和子弹，作好短兵相接的决战准备。工人深知保护电信设备的责任重大，提出了“誓与机器共存亡”的口号。临近最后时刻，敌兵果然来了，一场同敌兵的破坏活动进行的搏斗展开了。值班人员坚守电信岗位，地下党员更是坚守在总机室里，保持市话畅通；保卫人员实行武装保卫，一面与敌人进行说理斗争，一面准备在必要时显示武器的威力。敌兵理屈词穷，终因逃跑要紧，最后慌张鼠窜而去。

革命高潮以及决战时刻，无疑是要更加注重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发展进步力量，采用进取、开放、进攻等战术。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暴露身份而不再需要荫蔽与埋伏，更不意味着可以横冲直闯，赤膊上阵，重复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策略，而是积极而又审慎地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善于利用敌人在最后时刻急于南撤以保存实力的心理，进行智斗。如对武汉城防司令鲁道源最后施行以金钱送瘟神的策略；在反搬迁时，大搞“蘑菇战术”；在反破坏时，巧妙地采取伪装、调包、转移、隐藏等手法加以截留和保护；在调查敌情时，巧妙地弄到钥匙，乘夜深人静之际，打发档案柜，抄录、复制“征信资料”，以及通过社会关系弄到《武汉城防工事图》；在大造革命舆论的过程中，用“改头换面”、“假借名义”、“文不对题”、“正反对比”、“旁敲侧击”等手法，报道解放区的电讯，揭露敌人的阴谋；在敌人发布“十杀令”（即“特别戒严令”）时，襄南地委城工部的一位党员和几位城工人员，扮成“犯人”，背着用破被包着的人民解放军的布告、传单，由省会警察局的一个城工关系率领警官，装作押解人员，乘小船将宣传品送过江后广为散发和张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党既掌握敌人在撤走前的慌乱心态，又估计到敌人在绝望时狗急跳墙，因而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使其作好前仆后继、有条不紊地接替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严防投机分子的混入与破坏，始终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二）从生活到政治，从分散到集中

在初期的活动中，我们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存、生活、经济问题入手，在斗争中进行教育，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一步一步地提高起来，把分散的斗争一步一步地集中起来。用钱瑛的话来说，这叫做“从生活到政治，从分散到集中。”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政治斗争与生活斗争不仅密切联系，相互促进，而且迂回起伏，

循环交替。单纯的政治斗争不能持久，单纯的生活斗争不能提高和深入。从生活斗争与经济斗争入手，才使政治斗争有了更广泛的基础；而政治斗争又是生活斗争的集中与提高。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贯通，即在政治斗争中有着生活性，在生活斗争中也有着政治性。政治斗争与生活斗争往往是迂回起伏地交替进行，螺旋似地曲折上升。以武大为例，1946年夏复员回武昌珞珈山后，广大同学进行了抗暴斗争，接着要求补发复员费的问题提到了行动的日程，并且增添了改善校政和改善生活福利等内容。1947年春，国民党在前线节节败退，加紧扩军勒索，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挣扎在饥饿线上，从而掀起了“向饥饿制造者开战”的斗争怒潮，并指出造成饥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反共的内战，于是提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及“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这样就把生活斗争同政治斗争紧紧结合起来了。

武大同学运在“六·一”惨案后，从政治斗争转向以生活斗争为主，从同学与人民大众切身生活疾苦出发，开展助学运动、义卖活动、后湖救灾运动，及反饥饿、争温饱运动，提出了“要生存，要民主，要和平”的口号，渗透了很深厚的政治内容。同学们在公众场所和热闹地段进行劝募时，既揭露了敌人，又教育了群众，更锻炼了自己。特别是在1948年秋冬反饥饿、争温饱斗争中，武大、华大等校组织了“活命交卖会”，在汉阳门等地段摆开大拍卖的摊子，扯起“活命大拍卖”的旗子，敲锣打鼓，男女同学合唱“交卖歌”，真是喊一声价钱，诉一声苦。这“活命大拍卖”的场子，实际上成了教育群众，揭露敌人的讲台，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统治，使群众认识到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共内战所加剧的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是武汉民不聊生的总根源，而不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则不可能制止反共的内战和争取和平与温饱。这样逐步引导群众把生活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并同揭露“和谈”阴谋结合起来了，同反搬迁、反破坏、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紧紧衔接起来了，同坚持和谈的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紧紧联系起来了，从而把“反饥饿，反内战”，“争温饱”升华到新高度，推进到新阶段。

反搬迁、反破坏、保卫城市、迎接解放这场全市性的波澜壮阔的人民之战，标志着战略决战阶段的到来。但即使在这场政治性很强的斗争中，仍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提出“保住机器，保住饭碗”“湖北机器养活湖北工人”“铁路是铁路员工的饭碗”等口号，来抵制搬迁，并发动员工回忆抗战时期跟随国民党当局搬迁到大后方时沿途的悲惨情景，还发动员工不断要求发给加班费、迁移费、安家费和迁散费，使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带着浓厚的生活色彩，加强了政治斗争的综合效应。

同生活斗争与政治斗争相联系的，还有分散斗争与集中斗争。分散斗争与集中斗争，两者又是相互联系，循环往复的。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分散斗争即小规模接触是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的。在形势对我有利，敌人的弱点暴露，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时，及时地把分散的斗争集中起来，实行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当敌人还来不及组织镇压时，我们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到群众中去。如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发生时，出现了一场集中性的抗暴斗争，它把各校、各阶层的支援活动汇集在一起。斗争发展到一定时候，各校斗争又呈现分散状态。在全市各阶层、各种力量的汇合下，分散的斗争又过渡到集中的斗争，即反搬迁，反破坏，保卫城市完整，配合大军迎接武汉解放的斗争。

党善于抓住敌人在集中斗争中既想残酷镇压又怕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矛盾心理，适当变换斗争形式，促使敌人妥协让步，使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1949年初先后开展了两次罢教索薪斗争，迫使国民党汉口市政府作了让步。其时，武汉解放在即，市委常委张文澄决定，在群众经济要求得到适当满足时，及时地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来，组织群众进行保

校保产的集中斗争。涓涓之流终于汇成滚滚洪涛，纤纤之绩终成赫赫之功。

（三）从合法斗争到非法斗争

我们开展的许多斗争都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即以合法掩护非法。我们强调合法斗争，是因为革命“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①应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法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②我们反对合法主义，但是，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去组织群众，开展斗争。1947年2月，在面临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时，周恩来同志指出：“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③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势下，我们党充分利用合法的形式，尽可能扩大合法斗争的范围，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例如，武汉大学学生在“六·一”惨案发生后，以合法的形式，招待新闻界，发表抗议书，接待吊唁者，举办血案实物展览，派出赴京（南京）请愿团与答谢团，召开追悼大会，举行“出殡”（即抬棺游行）等，以充分揭露敌人，扩大影响；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发生后，工人们按照当时的民间习俗，组织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摇独龙送葬”的活动，1947年11月16日，乐队前导，血衣、挽联随后，由全厂工人列队护卫，队伍所经之处，市民们义愤填膺地谴责反动派的暴行。

寓政治于文娱之中，这也是开展学运的一种好形式。它既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又具有合法性，能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地下党员、进步同学在学生中教唱“山那边是好地方”、“翻身花”、“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激起了同学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解放区的向往。他们还唱跳“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等集体歌舞，坚定了斗志。武汉解放前夕，珞珈山上，响起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连过去埋头书本不问国事的“老夫子”，也同我们一起扭起了秧歌舞，真象一个小解放区。

在决战时刻，斗争中的合法性与非法性此消彼长，非法性中的合法性扩大了，合法性中的非法性缩小了，原来属于非法的活动一变而为合法的活动。例如，“应变”这一口号，原来是敌人提出旨在迁移备战的口号，地下党把它接了过来，利用其模糊性与合法性，赋予革命的内容，广泛地在各单位组织“应变委员会”或“安全互助委员会”等合法机构，开展互助联防、保产自卫等活动。

在决战时刻，地下市委为了制止在“青黄不接”的“真空”形势下可能出现的骚扰、抢劫等类事件，维护社会治安，便推动地方元老张难先、李书城等出面，利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作的“为适应形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规定，成立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还利用湖北省商会的合法机构和进步分子周家泉的省商会联合会理事的合法身份，向商界提出“以自身力量共谋社会的安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口号，组织了“武昌商民自卫大队”，打进国民党武昌市政府担任秘书主任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按照地下市委常委江然的指示，征得市长的同意，将市府库存的步枪和子弹交给商民自卫大队，使其在白崇禧部队撤退时出色地执行了护卫等任务，成为当时武昌市区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四）从运用统战法宝到开展政策攻心

蒋介石集团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陷于人民包围之中，越陷越深。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和我党的各项政策及其光辉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各个阶层。党为人心之所向，众望之所归。有识之士，与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爱国之心，除暴安良之义，保全梓桑之情，表于内而溢于外。如地方耆宿张难先、李书城、耿伯钊等，每当白崇禧部署和准备进行搬迁、破坏等倒行逆施的关键时刻，他们总是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当白崇禧要炸毁张公堤、武泰闸、水厂、电厂时，张难先等仗义执言，迫使白崇禧不得不表示妥协。

1949年初，白崇禧玩弄“和谈”阴谋，妄图搞“划江而治”，假意许诺一些条件，请元老李书城等到中原解放区去商谈“和谈”事宜。但李书城等归来后，白崇禧矢口否认他的诺言，使李书城极为气愤。地下党先后请他在武大等院校作访问解放区的演讲，他摆事实，谈感想，有力地揭露敌人，对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起到了一般宣传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的大批爱国人士，在反搬迁、反破坏斗争中，利用其合法身份、职权、地位和影响，抵制搬迁、破坏等活动，把所在单位的人员、物资和档案巧妙地截留和保存下来。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在学校安全互助团与学生自治会联合召开的一次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应变大会上，明确表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迁校”。接着他指出应变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安全；一是为了生存。他保证学校负责筹措全校5、6两个月甚至7月份的粮食及日用必需品；至于安全问题，他表示：“有待于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始能共渡难关”。他这一席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即使是国民党军、政、警、特等方面的上层人物，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决战时刻，他们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死心踏地愿为蒋家王朝殉葬的，只是极少数。特别是那些一向受到蒋的嫡系排挤的杂牌部队将领、地方实力派，更是心坏“异志”，亟愿弃暗投明，寻找自新投效之路。如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受过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受到蒋、白的排挤与疑忌，武汉临解放时，险遭白崇禧扣押，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仓猝逃遁，在武昌南金口镇率部起义，使白崇禧、鲁道源在截断退路的威胁下，仓皇南撤，终使武汉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即使是坐镇武汉、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白崇禧，与蒋介石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时时处处想为自己留条退路。他虽企图实行“坚壁清野”，实现搬迁、破坏的阴谋，然而他仍以保存自身实力为重。在民意难违、众怒难犯的情势下，他不愿也不能把坏事做绝。武汉地下党掌握了他的矛盾心态，利用他同蒋介石及其他方面的矛盾，因势利导，出奇制胜地制止和击败了他筹划的种种阴谋，避免了重大损失与牺牲。

武汉解放已有40年了。40年来，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与武汉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我们应当牢记这胜利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与理想，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奋斗，就不可能获得祖国与武汉的解放与新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胜利。今天，我们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努力发扬当年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竭力维护和发展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振兴中华，振兴湖北，振兴武汉。

（本文作者系武汉解放前中共武大总支书记）

注释：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②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③ 《关于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周恩来选集》上卷。
- ④ 系指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汉口市警察局、省会警察局。